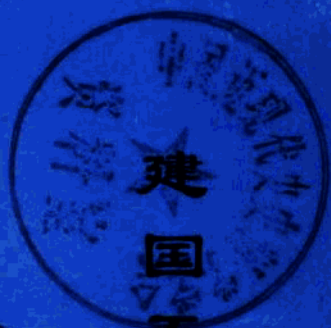


2401



建国五十年的贵州史学

论文集

《贵州近现代史研究文集》之七

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编

《贵州近现代史研究文集》

主 编:顾大全

副主编:尹克恂 何静梧 沈德海

编 辑:朱崇演 李守明 张建军 李人选

建国五十年的贵州史学论文集

目 录

建国五十年来贵州史学的回顾·····	熊宗仁(1)
史学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冯祖貽(13)
贵州党史研究及党史工作的回顾·····	唐 霞(15)
贵州民族工作五十年	
——兼叙民族历史研究·····	韦廉舟(21)
贵州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沈平 沈德海(33)
《西南军阀史》研究概述·····	顾大全(44)
五十年来贵州教育史的研究及现状·····	查继望(50)
贵州金融五十年·····	钱存浩(62)
建国后贵州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	柳蕴琪(86)
回顾我省建国以来工商业发展概况	
及其史料征研的思考·····	张 垠(91)
贵阳市修志事业的回顾·····	何静梧(98)
贵阳市政协文史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朱崇演(101)
编后·····	编 者(113)

建国五十年来贵州史学的回顾

熊宗仁

史学是贵州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学科,但在新中国建立前并未形成相应的研究规模和学科体系。贵州的解放,为我省的社会科学当然也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不仅使历史研究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而且为贵州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和理论创新的条件。

贵州历史科学发展的起步

(1949年11月——1957年)

解放初期,适应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培养、提高干部的形势需要,贵州史学承担了普及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任务。为配合清匪反霸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政治任务,史学工作者更以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教育群众,提高群众。1953年,贵州文史研究馆成立,着手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撰写历史资料和史学文章。民族工作者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也开展了民族历史方面的调查研究。

贵州史学的初步发展

(1958年至“文革”前)

从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是贵州史学初步发展的时期。贵州民族史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在建国前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有所进展的基础上,开始成为贵州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1959年,根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意见,省委决定建立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史学研究即成为该所的重要任务。稍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建立,民族史的研究更有组织机构的保证。60年代初,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持编辑出版的《贵州文史资料选辑》陆续出版。《贵阳师院学报》的率先创刊,为贵州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园地。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写印行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简辑》。贵州省民委、省民研所会同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民族研究所共同组成贵州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搜集、整理、编印了一批贵州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贵阳师院历史系也搜集、整理了一批贵州史的资料。贵州古代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也开始启动。1959年,《贵州解放十周年纪念丛书》的编写和出版,虽然明显具有“大跃进”、“浮夸风”的特点,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贵州省情的基本面貌及十年的建设成就,可视为贵州当代史的发轫之作。60年代初,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长的汪小川同志

陆续在《贵州日报》上发表了九篇历史小故事,对当时盛行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可以说是那一时期借鉴历史,观照现实的典范。

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虽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但从学科建设上仍是取得了成绩的。

贵州史学遭受严重摧残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

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是以《贵州日报》公开批判汪小川同志的《安顺二铺调查》和九篇历史小故事为发端的。紧接着批吴晗、“三家村”“的所谓”借用历史反党”,史学工作者被迫或盲目地为“左”的政治运动充当工具。在“评法批儒”、批《水浒》、批宋江,批周公等运动中,影射史学、侍婢史学盛行,歪曲和篡改历史,为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推波助澜。贵州史学遭受严重摧残,几乎成为一片荒漠。

贵州史学拨乱反正,走向繁荣

(1976年10月——)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贵州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健康发展,走向繁荣,贵州史学也开始立足贵州,走向全国,走向繁荣。

作为一级学科的历史学,本应包括考古、方志、中共党史等多门二、三级学科,但这里只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外通

史、断代史、专史为主的研究状况。

新时期的贵州史学从清算“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御用史学中焕发了青春。以古夜郎史和贵州咸同起义的研究为开端,逐渐拓展了贵州史研究的多个领域,迅速聚集了基本的科研力量,切入大区性和全国性的史学协作,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当代史、世界史、贵州史、史学理论、史学史、中共党史及比较史学等。现将主要的研究领域的情况介绍如下:

中国古代史研究:

1978年,侯绍庄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学说——兼评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一文,成为贵州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走向全国的先导之作。之后,贵州史学工作者在省内外发表的上百篇的中国古代史论文,从先秦到明清,几乎涉及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时期。史继忠、侯绍庄合著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一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而侯绍庄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研究》一书,是对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辛亥革命史及孙中山研究,是贵州史学工作者参与的全国有影响的研究课题。吴雁南、冯祖貽担任了华中师大章开沅、湖南师大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的分卷主编之一,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多位同志承担了该书的索引编写。贵州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文章。1981年,冯祖貽、顾大全的《贵州辛亥革命》一书,是系统研究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开篇之作。以《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增

刊出版的贵州省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汇集了 20 多位作者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80 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吴雁南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及顾大全、何长凤主编的《孙中山与贵州民主革命》两本论文集,代表了贵州学者对孙中山研究的基本状况。此外,吴雁南的研究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四篇系列文章、李双璧的《系统方法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冯祖贻的《辛亥前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反思》等论文,是较有影响的代表作。1991 年,为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肖允治等 4 人主编的《辛亥革命在贵州》出版,除了收入《贵州辛亥革命》一书的修订本外,主要是这次纪念讨论会的论文集。20 年来,贵州学者研究全国和贵州辛亥革命的论文超过百篇,形成了较有影响的规模效应。

与辛亥史紧密相关的护国运动史研究是云贵两省合作的重要课题。除了《护国文集》和一批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外,专著《护国运动史》,在国内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西南军阀史研究,是由黔、滇、川、湘、桂、粤六省区协作的“六五”全国史学规划课题,由此伸延出贵州军阀史,军阀人物以及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贵州学者在《西南军阀史论丛》1—5 辑上都发表了论文,在《民国人物传》六、七、八辑上发表了 20 多篇人物传记。由省社科院历史所集体编著的《贵州军阀史》以及贵州学者参加主编和撰稿的《西南军阀史》一、二、三卷,使贵州学者在国内赢得了一席之地,并成为 80 年代贵州史学研究的大热点。

近代教案研究,是贵州学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在全国较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以 1980 年周健钟的《贵州三教案》的出版为开篇,贵州学者参加了多次全国性、大区性的中国近

代教案学术会议,并在1989年主办了一次较大型的全国性近代教案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教案与近代中国》论文集,先后共发表论文数十篇。

熊宗仁的何应钦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80年代末至今既是贵州的也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项目,先后出版了《何应钦传》、《何应钦的宦海沉浮》、《何应钦晚年》三部专著,并在美国、台湾及大陆发表了3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在若干民国史研究领域提出了一家之言,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戊戌维新运动研究也是贵州学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领域。严修、李端棻、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人物的研究;维新运动与贵州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1998年10月,省史学会、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联合召开了有多位国内著名学者参加的“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学术研讨会,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也举办了同样内容的学术会议,发表了一批成果,并编辑出版了《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论文集。同年8月,竺柏松、李双璧的论文入选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获1999年“卓达杯”征文二、三等奖。

中国近现代史的综合性研究,是成果众多、研究者最广泛的领域。1982年吴雁南、杜文铎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纲》上下册出版,成为十多所高校的教材,也是有特色的学术性专著。1983年,贵州学者吴雁南、熊宗仁、曾凡炎等参加了《中国近代史讲话》的撰稿。1986年,吴雁南、杜文铎、冯祖贻、熊宗仁又参与编写《简明中国近代史》一书。1985年,贵州学者董有刚等人参与编撰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一书。次年,黄自为、沈德海、陈昌华等编写的《中国革命史简编》出版。

1988年,李双璧的《大文化系统:观察中国近代史体系的新视角》在《求索》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80年代中后期,吴雁南、向阳生、蒋国维等主编的《中外历史新编》中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两书,在体例上有所创新。1990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李双璧的《康有为严复变革思想比较》。同年,省史学会等单位主持编辑出版了《屈辱史、斗争史、胜利史》一书和《百年沧桑》论文集。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在中宣部等单位组织的全国征文中,贵州有5篇文章入选,其中史学文章有熊宗仁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问题》。贵州史学界编辑出版了《光辉的历程》、《不灭的光辉》两个论文集。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省史学会配合有关单位召开了全省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论文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贵州史学工作者撰写了一批相关的学术论文。全省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60篇,会后以《贵州党史资料》专辑的形式出版了论文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主办的全国征文中,熊宗仁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一文入选并收入全国论文集。冯祖贻、何长风、熊宗仁三人应邀赴台北参加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冯的《抗战期间内迁人口对西南社会经济的影响》、何的《抗战时期的贵阳文通书局》、熊的《论国民政府准备抗战之策略与何应钦》三文收入会后出版的论文集。90年代后期以来,贵州每年都有几十篇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发表。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及贵州文化研究,是90年代以来贵州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吴雁南、冯祖贻等人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是90年代初同一研究领域较

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此外,90年代初期还出版了李双璧的《从经世到启蒙》,吴雁南的《清代经学史通论》等著作。贵州是王阳明悟道和王学初步形成之地,贵州学者对王阳明及其思想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贵州成功地主办了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论文集。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联合召开了“中国文化与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1995年,吴雁南教授应邀赴台参加第三次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维新志士的对日观与社会文化心态》一文。1998年,史继忠的《诱人的伊甸园》出版,以新的视角和材料研究了贵州史前文化。他在今年出版的《中华五千年文化探索》中,阐释了他对中华文化的独特见解。张新民1998年出版了《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一书,汇集了他研究人物典籍、方志史著和哲学宗教的成果。吴雁南、冯祖貽等4人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和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系统研究,成为我省作者主持的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世界史研究:

世界史研究是以教材编写和科研相结合为显著特色,涉及世界通史、洲际史、国别史、中外关系史、世界史理论及比较史学等领域。1985年,蒋国维、唐同明、向群主编的《世界史纲》出版。项英杰参编了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古代史》、1986年出版的《世界史·中世纪史》。1989年,蒋国维等编写的《新编世界上古史》出版,次年又出版了《新编世界中古史》。贵州学者还参编了《世界现代史》、《当代世界史》等大学教材。唐同明参与主编了《非洲通史》。贵州学者在省内

外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世界史研究的论文。在世界史研究中,项英杰及其弟子吴筑星、马骏骐、蓝琪等共同承担的中亚史研究在国内引人瞩目,除了一批论文,译著外,项英杰主编的《中亚——马背上的文化》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吴筑星的《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则在体系架构和考辨方面有所突破。

贵州地方史研究:

贵州地方史研究,是五十年来贵州史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全省史学工作者呕心沥血辛勤耕作的园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80年代初,由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后来成立的省社科院历史所及其有关单位带头聚集了省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共同进行了夜郎问题研究,先后出版了《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之二、之三和《夜郎史探》四本论文集及朱俊明著的《夜郎史稿》,并在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批古夜郎研究的论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史研究的先导。1998年出版的王子尧等编著的《夜郎史论》,则是以彝族文献为主研究夜郎史的创新之作。198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春元主编的《贵州古代史》,成为首次系统研究贵州古代社会的专著。80年初期王燕玉的《贵州史专题考》及其尔后的修订本的出版,对贵州古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考释。1987年,周春元,张祥光等人合著的《贵州近代史》出版,1998年,何长凤、李北杓等主编的《贵州当代史》出版,使贵州史的研究初具完整体系。从1993年开始启动的大型贵州通史的编纂工作,今年完成。这是由省委、省政府直接抓的长期课题。该书共5卷9册,约400万字。可视为集50年贵州史研究之大成者。民族史研究是贵州地方史中独具特色与优势的领域,以苗族、侗

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五部简史的出版为标志,贵州民族史的研究已成体系。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合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史继忠的《贵州民族开发史论》,在贵州民族史研究中独辟蹊径。范同寿的《贵州简史》,专题式地勾勒了贵州历史的线索。在贵州史的专题研究方面,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周春元、冯之锐等人合著的《遵义人民革命史》;范同寿、熊宗仁合著的《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林国忠的《贵州交通史略》、《贵州工业发展史略》、《贵州矿产开发史略》;何静梧的《贵阳历史研究》;范同寿、张自勤合著的《贵阳人物》等。80年代初期组织出版的贵州史地小丛中已出版的历史著作有史继忠、林超民合著的《李定国的故事》、龙岳洲的《石柳邓的故事》、熊宗仁的《孙可望与永历皇帝》、《姜应芳起义》、《五四运动在贵州》、《严修视学贵州》,顾隆刚的《四渡赤水之战》,顾大全的《护国运动在贵州》,郭必勛的《张秀眉起义》等。经济史研究是贵州地方史研究中的后起之秀。80年代杨开宇、廖唯一合著的《贵州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是贵州经济史研究的最早著作。此后,有影响的著作有:贵州农村合作经济简史编委会主编的《贵州农村合作经济简史》,熊大宽的《贵州供销合作经济简史》,唐玉芳的《贵州当代发展史稿》等。1998年底出版的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编委会主编的《贵州六百年经济史》,是系统研究贵州古代、近代和当代经济的代表性著作。本月下旬将出版的由团省委主持,省社科院历史所具体编著的《贵州青年运动史》,是记述80年来贵州青年运动发展历程的专著。

史料的搜集、整理、点校和编研出版,是贵州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工程。50年来,许多学者默默无闻地致力于这一工

作。除方志、党史系统整理出版的大量史料外,有影响的史料集有:1964年出版的《〈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1981年出版的《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1982年出版的《〈西南彝志〉选》,1983年出版的《〈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1985年至1992年陆续点校出版的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1988年出版的《〈平黔纪略〉点校》,1994年出版的《周素园文集》等。《黔山红迹》,《红军长征在贵州资料选编》等文献、档案资料的汇编,促进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研究。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当代中国的贵州》、《贵州省情》及其修订本,《当代贵州大事记》、《改革开放20年的理论与实践·贵州卷》以及从1985年到1999年间出版的15部《贵州年鉴》等,都是研究当代贵州最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一提又难以统计的是全省各级政协所编辑出版或内部印行的数百种文史资料 and 文史资料丛书,全面反映了贵州各地近百年来历史变迁的方方面面,为贵州近百年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五十年来贵州史学的特点

建国五十年来,贵州史学走过了艰难曲折但却是卓有成效的历程,除了史学研究始终为现实服务(无论这种服务是直接间接、是对是错、其产生的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这一贯彻始终的特点外,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在指导思想上,从解放初期朴素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史学研究,中经50年代后期“左”的思想影响,开始机械地把唯物史观等同于史学理论,以至到“文化大革命”中把阶级斗争学说当成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大搞

“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贵州史学逐步是上在唯物史观科学理论指导下,把历史当成科学来研究的健康轨道。

二、从单纯的普及历史知识和在个别领域进行初步研究,发展成基础理论与普及应用研究相结合,两翼齐飞的研究格局。

三、从个别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成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并开始向多学科联合研究的方向拓展史学生存空间。

四、研究成果由少到多,由粗到精,由在全国没有任何影响到部分成果在全国产生了影响,有的还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史学研究队伍由少数业余作者或兼职研究者的单兵作战,逐渐发展成为多学科、多系统、多层次的老中青三结合,专兼职相结合的史学队伍。

五十年来,贵州史学研究也可以总结许多不足和缺憾,如史学研究的成果总量十分可观,在全省各学科中名列前茅,但高质量的成果所占比例不高;史学研究队伍年龄结构老化、知识结构老化、研究手段落后;史学研究如何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等关于贵州史学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尚有待探索。但是,我们可以说,总体上贵州史学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为贵州社会科学事业的真正繁荣奠定了自身所担负的基础。

(本文作者为贵州省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史学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讲话提纲)

冯祖贻

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今天,面临世纪之交,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日益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进行科学的回答,以便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变化的世界,因势利导,避免不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因素,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如:东欧与苏联巨变至今还没有一本比较深刻的历史原因分析的书;“法轮功”在当今为什么能得到传播,其历史原因在哪里等等。马克思在很短时间内便写出《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法兰西内战》,这种为现实服务的精神,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

二、站在新的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面前,传统的历史科学应当广泛地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以丰富自己,否则不能适应时代需要。

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打破了原有学科界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信息的大量产生,传统的历史科学研究方法正在起变化。论文有的已不单是文字,还包括影象,形成了影象加说明式的新的历史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的交流更丰富多采,如历史与统计的结合形

成统计史学等等。那种固守一隅的现象恐怕市场会越来越小,时代呼唤着理论,对于历史科学也是如此。

三、21 世纪将对从事历史科学研究、教学的人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总体上,社会科学已提出需要政治素质好、文理兼备、具有开创性人才要求,历史科学也应如此。将来外语、计算机的使用将成为一般就业的必需,搞科研、教学的应学得更好。专业知识的掌握,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老三段”(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上,而应有更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如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对自然科学知识也应有一定了解。否则从事研究、教学都将发生困难。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仍是我们的指导方针,这一条不能丢,我们历史科学自五四以后逐步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这是我们历史科学的好传统。老一辈史学者如郭老、范老、翦老的刻苦钻研与追求真理的精神更值得我们继承。在我们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央对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历史科学也应不断开拓创新,迎接美好的明天。

(本文作者为贵州省社科院副院长、省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是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顾问。)